



乔力 / 主编
中国古代文学主流

杨树增
著

先秦诸子散文

诗化的哲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主流”书系之九

乔 力 / 主编



先秦诸子散文：诗化的哲理

杨树增 /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主流
乔 力 主编
先秦诸子散文——诗化的哲理
杨树增 著

责任编辑:沈伟东

封面设计:林胜利

封面制作:张 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541001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核工业中南 310 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875

字数:260 千字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3 000 册

ISBN 7-5633-1846-1/I·089

定价:15.00 元

总序

乔力

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中,无数优秀作家及作品,犹如满天星月映辉,绚丽夺目。就其整体发展势态而言,其呈现为不均衡的、流动变化着的一种过程,即在不同历史阶段里,各类文体兴衰更替。有些或已臻辉煌顶峰,从而成为具经典艺术价值的范型,被视作某个特定时代的文学主流。正是这些交替出现的主流,导引、制约着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中国文学长河的走向。

对于这种具有历史规律性的重大创作现象,古代文论家们早已有所认识,如晚明袁宏道、焦循等。至本世纪初,王国维承旧说再更益以新时代的通达眼光与宏阔气度,正面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理论,称扬:“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元戏曲

史·自序》)要言精语,蕴积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美学意义,为学界普遍认同,遂成共识。

“中国古代文学主流”书系,基于上述观念,依明晰的“史”的脉络,采取断代置点、连线成片而总合为一的结构方式,由之勾画出贯通上下、包罗万象的中国文学大厦的整体框架。它按文体分别,参照相应的时代文化环境,选择能够代表其最高成就、充分显示审美特征,或者标志重要演进阶段的有关断面,作为论述对象。具体说来,有以下诸方面:

——首先是诗歌类。这里是广义的概念,包括词和散曲在内,并附及诗论。共计7种,即《先秦诗:真与奇的耦合》、《汉魏六朝诗:走向顶峰之路》、《唐诗:日丽中天》、《宋诗:以新变再造辉煌》、《唐宋词:本体意识的高扬与深化》、《元明散曲:大俗之美的张扬与泛化》、《诗论:审美感悟与理性把握的融合》。

——其次则为赋类。大致而论,赋是游移于韵文和散文之间、骈散兼行的非常特殊的文学样式,有《赋:时代投影与体制演变》1种。

——复次便是散文类。散文是历史最悠远、最具变异性,而体式也最为庞杂开放,除却韵文之外几乎无所不容的一种文学样式。共计有4种,约略体现出它由实用到审美、自杂散文向纯文学散文演进的轨迹,即《先秦诸子散文:诗化的哲理》、《史传文学:文与史交融的时代画卷》、《唐宋散文:建构范型》、《明清小品:个性天趣的显现》。

——再次为戏曲文学类。有一种，即《戏曲文学：语言托起的综合艺术》。

——最后是小说类。它的源头虽然可以追溯到上古，但发展却十分缓慢，而一旦进入文体成熟阶段，又很快形成高潮。共计有2种，即《文言小说：文士的释怀与写心》、《白话小说：从群体流传到作家创造的社会图卷》。

总之，考察诗歌（包括词、散曲在内的广义概念和诗论）、赋、散文、戏曲文学、小说共计5大类，含有15种专著的结构形式，可见出本书系固然某种程度上也有着文学史性质——如颇注重文学的分体断代——但它实质上，却迥异于以往文学史那种根据时间顺序，全盘罗列一切文学样式的各种创作现象；或者按照成例，先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背景之类，再进而论析文学本体来推演比附的思维模式。

本书系立足缜密开阔的理论观照和精微细致的审美感受，就“本体论”——“流变论”的上下编二元组合双向审视中，注重时间概念与时代概念在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上的一致，由之确认于大文化视野里，重新对中国古老的文学传统作出现代阐释。同时，依表层势态和深层运动所显现、蕴含的发展演化规律，筛选最能标志文学价值与特征，及相应时代意义的特定文体，阐释贯穿其中的艺术精神，及其同哲学、宗教、社会心理等相互间的作用影响，换言之，是力求展示中国文学中仍然保持生命活力的那部分性质，并试图发掘出它之所以超越已

经被历史尘土埋没的另一部分的原因所在。

我们的这一书系所设置的结构框架,除却本文开头已阐明的那部分理由外,还有下面的一些考虑:

一是这种兼取时代与文体的主流观念,以其客观、简赅、谨严、实证而获得文学自身运行发展规律的把握和创作业绩的肯定。它显然更便于系统疏理源远流长、纷繁复杂的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主导线索。

再是这种已相当成熟、具有高度稳定性的提纲挈领式的论断,经过了漫长时间的检验,被文学、文化界,以及整个社会所普遍认同。相应地,它也方便我们的实际运作——从总体框架、局部结构的拟定直到具体的细节写作。

现在奉献给读书界朋友的“中国古代文学主流”书系得以面世,首先要感谢学界各位同仁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热情支持。我们遵循事业与友情并进的一贯宗旨,协同完成了本书系。能够为学科建设、学术发展作些贡献,我们由衷地感到高兴!诸多不当处,敬请各位读者、学界通人教正。

1999年初春
于济南玉函山房

前 言

先秦文化是在中国文化发生、开拓的时期,我们的先民一代又一代所创造的精神成果,先秦诸子散文作为先秦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其深刻、成熟的哲理成为中华民族思想库中的璀璨瑰宝,以其美学价值极高又风采各异的艺术风范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楷模与典范。

所谓先秦诸子散文,实际仅指春秋战国之际各个学术派别的文章。在此之前,中国散文至少已经有千数年的发展历史,先秦诸子散文有着蓄积久远的文化积淀。先秦诸子散文直接源于王官文化,或称史官文化,王官文化的代表性典籍便是所谓的“六经”,或称“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先秦诸子散文一方面借鉴、继承了六经的思想与艺术的精华,一方面在思想与艺术性上又有重大的突破与创新,使散文从官方严格控制下解脱出来,从经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成为个人自由表达思想的工具,并与从史官文化中分化出来的先秦史传文学一道开创了中国散文第一个辉煌的黄金时代。

先秦诸子散文与先秦史传散文的形成,标志着王官文化的衰落与士文化的兴起,导致这种巨大的文化变革,首先是缘于社会的变革。

先秦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时期,它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初级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大约在公元前 21 世纪,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诞生了,它完成了由野蛮向文明的决定性跨越,拉开了华夏文明的序幕。夏王朝奴隶制的建立比古希腊的奴隶制大约早 13 个世纪,它以其“早熟”的特点,为推进人类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因“早熟”的特点制约了此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的基本走向。中国奴隶社会的“早熟”带来先天不足的特点,尽管中国的奴隶制又经历了大约一千多年的发展,但和晚来的古希腊奴隶制相比,奴隶制社会的诸多因素,如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劳动分工、商品经济等等,都发展得很不充分。它一方面使中国历史加快了前进的步伐,另一方面使过早步入封建社会的西周保留了大量的旧社会残余。当古希腊刚刚在发展其奴隶制的时候,中国社会又面临着一次翻天覆地的历史转折,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转型。由于大量地存有旧制度残余,也由于这场变革比较彻底,所以变革进行得异常激烈而持久,但社会的总趋势是封建领主制逐渐向封建地主制转化,先秦诸子散文就是在这种转型时期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由于社会所有制的巨大变化,必然引起社会关系以及一切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变化,社会内部不仅产生了新兴地主阶级及其新的阶级意识,而且产生了新的理论的代表人物——诸子。诸子是新兴的士阶层中的饱学之士,随着士阶层的崛起而登上当时的历史舞台。封建领主制的全面崩溃,为诸子赢得了施展才华的天地,他们摆脱了宗法制的层层束缚,获得了相对的自由,对社会的一切现象皆可自由地“横议”,和一切学派皆可

自由地“争鸣”，他们一方面不自觉地背负着旧的历史传统，一方面又自觉地面对着新的社会现象，努力以自己的理论反映出转型期社会变革的现实，也以自己的理论参与推动社会的变革。

其次，先秦诸子散文是先秦文化，特别是夏、商、周三代文化积累的必然结果。三代文化体现了古老华夏民族的思维、智慧、审美和民族精神，它们对先秦诸子散文之所以有重大的影响，在于其本身就具有自觉的理性精神。中国古代文化的理性精神与西方文化的理性精神有所不同，它除了具有逻辑推理、抽象思维的能力外，还包含着认识主体本身品性修养的内在力量，也就是不仅具有感知、判断的能力，还包含着人性完善、人格高尚的力量。中国传统的理性精神，侧重点不是逻辑推理的过程与能力，而是伦理道德的阐述，在关注抽象哲理的同时，更加关心的是现实的政治、社会、民生问题，不是倾全力以冷静的思辨去分析某一事物的性质与规律，而主要是从民族的、时代的、社会的整体方面去直觉地感悟，以炽热的感情去追求认识主体的价值与人生意义。我们之所以把先秦诸子的文章称为“诗化的哲理”，就是因为它继承了中国古老的理性精神的民族特点，具有伦理的、感情的色彩，它的哲理是属于艺术与美学型的。

中国传统的理性精神特别强调认识的主体——人，在其理论思维中，以人道、人性、人生、人格为本位，组成了一种知识意向和价值意向，其最基本的思维模式便是“天人合一”，这是一种自然与社会、宇宙与人生在观念上一体化的哲学思维模式。孔子、孟子的仁学，道家的无为而治，荀子的“制天命”，都是把人与万物融为一体，在客体与主体之间，强调人的价值，确认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诸子之学使中国传统的理性精神的重心最终定位。以人文主义为特征的先秦诸子理性精神是古代理性精神的高度发展，诸子掀起的理性精神的新高潮，成为中国理性精神高

度自觉的伟大开端。

封建领主制的瓦解,传统天神权威的失落,社会发展需要的呼唤,士阶层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等等,都为先秦诸子散文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于是在春秋战国之际,各种学派与学说便应运而生,一时竞起。他们各持自己的哲学观、政治观、人生观、审美观与方法论,在互相辩难中,又互相吸收、渗透,不断丰富、完善着自己的理论。他们的学说相反而相成,互补又互融,如百川竞流又同归于大海,造成了中国文化的空前繁荣与发达,从不同角度为新的封建社会的建立提供了新的意识形态。

就如先秦史传文学是历史与文学的混合形态一样,先秦诸子散文也是一种混合的形态,即哲理与文学融为一体的综合形态。先秦文化不论哪种形态,都把求真——认知、求善——评价、求美——审美这三种把握世界的方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那时的文学还没有完全从文史哲混合的形态中分离出来,人们在叙述历史与议论事理时,仍习惯于运用形象的手法,这样,历史著作同时也是以历史事件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哲学著作同时也是以哲理为中心的艺术散文,使历史文学化,哲理诗情化。先秦诸子散文常采用叙述、描写甚至抒情的方式,运用生动的事例与形象来说理,论辩中渗透着作者强烈的感情,显示着作者的人格与性格,又注意采用精美的文辞与不同的艺术风格,使理性概念伴有诱人的情趣,抽象思辨中涵容着一定的美学意蕴。

即使从文学角度研究先秦诸子散文,也要从文化方面切入,将先秦诸子散文置于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发展长河之中,置于中国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来审视它形成的原因、复杂的综合形态、文体的发展过程,从而准确地揭示其艺术特征与艺术价值以及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历史作用。

同时,又要注意对具体学派的创作进行具体的分析与把握,

使宏观博览与微观细品有机地结合,理清诸子各学派形成与发展的脉络,归纳出各学派独特的美学精神、艺术特征、论辩特点、文体结构等等,并对其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品进行比较细致的阐发与评说,使整体把握学派的特征与精彩例作的深入剖析二者互为印证。

先秦诸子号称“百家”,《汉书·艺文志》主要列了“九流十家”,本书主要从不同的艺术风范及艺术成就来考虑,选择了儒家、墨家、道家、纵横家、兵家、法家等六家。儒家学派向列诸子之首,在文学方面的影响也仅次于道家。儒家改造了王官文化使用的艰涩古奥的书面语,使用了一种生动、活泼、通俗的新文体,常以雍容温雅的语调,简洁凝练的格言警句来表达深刻的思想,使抽象的哲理变得情趣盎然,耐人寻味。在《论语》、《孟子》、《荀子》之中,处处闪现着一个人格高尚、气度雍容、胸怀博大、热心于济世救民的君子形象。语言朴实自然而意味隽永,义正词雅而酣畅雄肆,思想弘深而论证缜密,为后世散文奠定了现实主义的基础。

墨家与儒家在战国初、中期影响都很大,世称“显学”。墨家的学说集中于《墨子》一书,其思想核心为“兼爱”,与儒家的仁学有联系,但墨家反对儒家有等级差别的爱,他们的泛爱思想反映了广大小生产者的心理。与其朴实的思想相适应,墨家的文风质朴、显豁,反对繁文缛节,为文“尚质”,文意明晰不隐晦,语言朴素不雕琢,其文章中的严密的逻辑性,在诸子散文中尤为突出,其系统的逻辑思想,为中国逻辑学奠定了基石。

道家主张自然无为,追求精神绝对自由,能摆脱功名利禄的束缚,所以能够站在局外冷静地观察人情世态,但道家的散文重点不在再现现实的景况,而是重在宣扬超脱现实的隐遁思想,描写自己的理想社会与理想人格,塑造着一个独立特行、自由逍遥

的隐者形象。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与庄子,所以又称道家之学为老庄之说。庄子的散文,使用“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极富想象力,意境开阔,构思奇特,充满神奇的色彩。庄子对具体物态却有着精细的观察,对心理、细节有精彩的描写,能抓住人物的本质特征,给以夸张,使特征表现得异常突出。庄子还常以谐谑、幽默的寓言,对现实社会中的丑恶与虚伪寄寓辛辣的讽刺。道家的艺术想象力和艺术表现力在诸子中最突出,是他们开辟了中国散文中的浪漫主义新天地。

纵横家是战国中、后期激烈兼并战争的产物,以持合纵与连横之说游说诸侯而得名,代表人物是苏秦和张仪。由于他们奉行实用主义,以智谋与辩才来换取富贵,所以不志于学,而志于术,玩弄辩术、诈术和权术,特别讲究辞令艺术。他们的辞令有磅礴凌厉的气势,雄肆奇特的夸饰,委婉辛辣的讽刺,敷张扬厉的铺陈,剥肤及髓的辩驳等等,比原来“行人”的辞令更“变本加厉”而达到极致。

兵家在《汉书·艺文志》中单列而不属于“九流十家”,兵家一般也不参于“百家争鸣”,他们是先秦时期专门研究军事的学者,然而他们的军事理论的阐述也运用了文学的笔法。以《孙子兵法》为例,其文辞简约而旨意深远,体系博大而论述精粹,有意追求文字的整齐,语言常带协韵,时见偶句排比,具有诗的情韵,结构严整,前后照应,首尾圆贯,列于诸子艺术散文行列,也很有自己的特色。

法家是先秦时期主张法治的一个学派,其集大成者是战国末期的韩非。战国末期,政局渐由诸侯分治趋向统一,学术上也由百家争鸣而渐趋合流,韩非能全面总结前人的思想成果,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新理论,为大一统封建中央集权制新社会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武器。韩非

对社会动向有较为准确的把握,所以在其散文中,观点鲜明,析理透辟,笔力峻峭。韩非的法治思想与其强化君主个人独裁专制的目的本身就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这不仅是造成法家人物悲剧性结局的根本所在,也是造成韩非散文饱含悲愤感情的基本原因,韩非散文中有一种悒郁孤危的忧患,一种惨怛不平的悲愤,体现了韩非对法家不幸命运的冷静思考。韩非同庄子一样,擅长以历史故事和寓言故事来阐明道理,其故事中的人物形象贴近现实,比较真切感人,深刻地体现了他的法治思想,反映了现实生活的本质。无论思想性与艺术性,韩非都堪称诸子的殿军,他为先秦诸子散文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只有通过诸子各派及其学术作具体的评析,才能进一步认识诸子各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同建树与开拓,正确理解他们相互之间的异同关系,对先秦诸子散文作更加深入的把握。

目 录

前 言	(1)
-----------	-------

上编 本体论

第一章 六经后散文的新流向	(3)
第一节 先秦诸子散文界说	(3)
第二节 诸子散文产生前中国文体概况	(8)
第三节 中国散文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13)
第二章 扎根于大变革时代的土壤	(16)
第一节 动荡的社会转型期	(16)
第二节 王官的沦落与士的崛起	(22)
第三节 处士横议与百家争鸣	(28)
第三章 沐浴着理性精神的光芒	(36)

第一节	先秦理性精神的民族特点·····	(37)
第二节	诸子以前理性精神的发展·····	(42)
第四章	流派纷呈与殊途同归·····	(52)
第一节	俊义蜂起引出千年评说·····	(52)
第二节	相反相成与互补互融·····	(64)
第五章	哲理与艺术的高度结合·····	(74)
第一节	关注人生,追求文采·····	(76)
第二节	理在事中,议而有象·····	(85)
第三节	投入感情,显示性格·····	(98)
第六章	论说体制的发展与成熟·····	(107)
第一节	语录体的初创·····	(108)
第二节	语录体向专论体的过渡·····	(112)
第三节	论说文体制的成熟·····	(117)
第七章	历史与未来的精神宝库·····	(125)
第一节	千古流播的文化传统·····	(125)
第二节	经古常新的艺术价值·····	(131)
第三节	历久不衰的美学原则·····	(144)

下编 流变论

第一章	经世化民的箴言:儒家的散文·····	(157)
第一节	儒家学派及其代表人物和著述·····	(157)
第二节	儒家散文中刚正的儒者形象·····	(167)
第三节	儒家散文的隽永、雄肆和缜密·····	(175)
第二章	满腔兼爱利天下:墨家的散文·····	(187)
第一节	墨家学派及《墨子》·····	(187)

第二节 《墨子》的显豁、质朴和严密	(197)
第三章 曼衍诗情抒追求：道家的散文	(206)
第一节 道家学派及其代表人物老、庄	(206)
第二节 道家散文中的精神世界与独立人格	(214)
第三节 道家散文的奇诡、精妙和辛辣	(227)
第四章 敷张扬厉的辞令：纵横家的散文	(241)
第一节 纵横家及其代表人物苏秦和张仪	(241)
第二节 纵横家散文的酣畅、夸饰和婉曲	(250)
第五章 胸装万方巧运筹：兵家的散文	(259)
第一节 兵家与“兵经”	(259)
第二节 兵家散文的精粹、情韵和圆贯	(266)
第六章 热血铸就治国策：法家的散文	(275)
第一节 法家学派及其代表著作	(275)
第二节 法家散文的峻峭、悲惨和深切	(282)